

陈鹤琴 教育文集

上 卷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北 京 出 版 社

陈鹤琴 教育文集

上 卷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京 出 版 社

陈鹤琴教育文集

(上 卷)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5.125印张 626,000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300

书号: 7071·916 定价: 2.95元

编者说明

陈鹤琴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1919年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曾经赞助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筹办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并担任该校指导员和第二院院长。1923年，在南京创办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鼓楼幼稚园，提倡中国化的幼儿教育。从1920年开始，他以自己的孩子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长期的、连续的儿童发展研究，是我国以观察实验的方法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最早的学者之一。此外，他对家庭教育、小学教育、师范教育、智力测验和推广新文字运动，也都做过不少创造性的实验和研究，并发起和组织过全国性的教育研究团体。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南京师范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六十年来，陈鹤琴写了不少教育论著，大部分是他亲身实践的总结，也介绍了西方儿童心理和儿童教育研究的成果。我们搜集到的有教科书、讲义、专著、论文、实验报告、儿童课本以及儿童课外读物等，总计约三百多万字；大部分发表于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刊物、杂志上，有的作为专著出版发行。他还主编过多种儿童教育刊物。这些著作，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总结前人教育实践的经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培养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们择选部分有代表性的、能够反映他的教育主张和教育实践、反映一定时期教育实况的论著，汇编成这部《陈鹤琴教育文集》，以供教育史研究者、儿童心理学研究者、儿童教育工作者、广大教师和父母们研究参考。

陈鹤琴先生对于文集的编辑和出版给予很大的关怀。不幸的是，就在文集行将问世之际，先生于1982年12月30日病逝，竟未及亲见文集出版。我们谨以此书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陈鹤琴教育文集》分两卷出版。上卷包括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等部分；下卷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和文字改革等部分。各部分的选文基本按写作年代先后排列。卷末附有作者的生平和著作目录。编选时，我们对各篇之间的某些重复，作了一些删节，个别地方作了一些修订。除此之外，基本上都按原版排印，包括用词、标点等只要读者能看明白，就不作改动，力求保持原作的面貌，以反映写作的时代特点。

当《家庭教育》一书初版问世时，陶行知先生曾于1925年发表了《评陈著〈家庭教育〉——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一文，《家庭教育》再版时，即以此文作为序言。现在，我们按照陈鹤琴先生生前的意愿，将该文刊于卷首，作为对陶行知先生的纪念。

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 and 帮助。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心理学家潘菽同志和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倪海曙同志为文集作序；南京师范学院副教授钟昭华等同志写了专文；中国人民大学陈维雄同志参加了编选工作。我们谨此表示感谢。本书由我所陈秀云同志负责编选。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983年1月

序

潘 菽

陈鹤琴同志在他最早的一本著作《儿童心理之研究》的自序中，开头就说，他很爱儿童，儿童也很爱他。他在平常的场合也常常说这种话。这样的一种话可以基本上概括他一生的为人、工作、科研以及事业。因为热爱儿童，所以儿童也喜欢他；所以他要研究儿童，了解儿童；要讲求幼儿教育，要宣传家庭教育；要办幼儿园，要办小学；要常常谈怎样做父母的问题；要研究儿童玩具；要关心儿童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办师范，要重视师资的培养等等。在我们的社会里，确实需要有千千万万象陈鹤琴同志那样热爱儿童的人。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对下一代的身心发育给以极大的关心；要研究他们，科学地了解他们，给他们以最良好最合理的环境和教育。

有人称赞陈鹤琴同志是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这也是对他的一种恰当的印象。我也有这样的印象。他确实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一个很纯朴的人，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真正热爱儿童，儿童也才能喜欢他。他不仅喜欢自己的几个孩子，也喜欢所有见到的儿童。不仅自己几个孩子喜欢他，所有见到他的孩子也都喜欢他。其实除非别有心肠的人，所有的人也都这样看他。他好象是一个随和的人，但自有他的风骨。正因为这样，他在旧社会里并不怎样顺利，是不容于某些有势者的。他也

不顺从于某些有势者。他曾因支持和参加爱国进步文教活动，受到日伪暗杀威胁，解放前夕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拘禁。在旧时代，他的抱负并没有得到怎样的施展。尽管如此，在困难艰苦的条件下，他仍然奋力从事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工作，写了不少论著文章和其他读物，对我国的教育，特别是儿童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学术上，陈鹤琴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由行而知。用现在的话说，他能做到理论结合实际。他是一个边知、边行、边写、边讲，即是把研究、实践或发表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他同时研究儿童，同时办幼儿园，同时在自己的家庭里实施幼儿教育，同时宣讲儿童心理和幼儿教育。他所讲所写大部分是他自身的观察研究所得，是他自身的体会和心得，所以阅读或听讲的人都会感到特别亲切有益。取得了不是仅仅运用书本知识，从概念到概念所能取得的效果。这是很值得提倡和学习的一种学风。

他最受到欢迎的一本著作是《家庭教育》。此书在过去出版以后就重版过好几次。最近此书又经过作者的修订而予以再版，仍受到欢迎和好评。可见，此书是经得起考验的，对我们的新社会也仍有价值和需要。这本书大部分是分条论述“怎样教小孩”（书的副标题）的许多切合实际的理论和具体的建议和办法（共 101 条），而很少空文。它是陈鹤琴同志多年对儿童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的经验总结，其中有许多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给此书原版写序的郑宗海先生阅读过此书后觉得“珠玑满幅，美不胜收，有数处神乎其技，已臻乎艺术的范域。”陶行知先生读后也对书中有些地方有达到“神乎其技”的感觉。这些话应当都非溢美之辞。这里要提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陈鹤琴同志在处理儿童教育的问题上能达到“神乎其技”的艺术境界呢？这是因为他有天生的这种本领吗？当然不是的。我想，他之所以能达到这样高度的成就，主要还是因为他全心全意

扑在孩子身上，千方百计为了使他们能得到身心健康的发展，处处体贴他们，为他们着想，但又决不姑息他们，纵容他们，迁就他们。这就要当孩子们出现问题时精心考虑，仔细琢磨，以求得出正确合理的处理方法，而决不简单粗鲁地予以对待。这样就很有可能想到一些相当巧妙、出乎意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而为一般人所不能想到也不能做到的。他又为什么能对孩子们那样地真心诚意，体贴入微，以致能考虑周到，设想精细呢？那又是由于有一颗赤炽的热爱孩子们的心。这颗心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读了陈鹤琴同志的书或文章，要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应该是他那颗热爱儿童、关心社会、造福人类的“赤子之心”。至于他所曾采用的许多具体办法，在新旧社会很不相同的情况下，当然是不能照搬硬套的，比如今天我们社会的家庭，已很少是陈鹤琴同志那时所写的书中所设想的那种家庭，而是崭新的、许多是双职工的家庭。但从这些方法中所体现的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及儿童教育的基本原理，今天也还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编辑出版这部文集是必要的，适时的。这，一是因为需要保全这部分历史文献，二是因为这些著作在现在仍有不少现实的意义可供学习，可供参考。从事选编的同志作了大量精细的编辑工作，把其中有一些已显然陈旧的内容经过仔细的斟酌而删改掉了，但精华和可供参考的大部分都仍然存在。这些删改是必要的。因为把为时已久的物件，给它们抹去灰尘，加一番整理的功夫，可以更显出它们的光辉而无所损。

陈鹤琴同志由于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是能紧跟着时代前进的。他在旧中国不免郁郁于心，到了新中国则光辉焕发了。他的理想正在逐步得到实现。这是由于我国的幼儿教育战线上有了越来越强大的队伍。他在解放后，学习很努力，非常热爱党，向往于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和我同属于九三学社组织，所以又有了同志的关系。他因高龄，已抱疾卧床，但仍是巍然一老，

心热如旧。他嘱他的女儿秀云同志转托我给他的文集写几句话以当序引。我义不可却，于是就写了上面一些话。

1982 年 8 月

热心扫盲教育和文字改革 的老教育家陈鹤琴先生

倪 海 曙

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文集即将出版了。

中国的新教育事业是本世纪初开始的。先生是第一代创业的新教育家，也是第一个出国研究幼儿教育的人，可是先生对于中国新教育事业的贡献并不限于幼儿教育，对于普及教育、师范教育也做了大量的创造性的工作。由于先生一贯热心普及教育和文字改革，有过许多贡献，集中也选有他这方面的论著，编者要我写几句话，我觉得十分荣幸，也感到义不容辞。因为在抗日战争初期，我曾经追随先生从事上海难民收容所的拉丁化新文字教学实验。先生纯朴崇高的教育家品德，他的爱国热情、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曾经深深感动过我们年轻的一代。

各级教育的基础是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的主体是语文教育，语文教育的关键是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为了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在“五四”时期，新教育家们首先改革了教科书的文体，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语文运动史上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是经过许多前辈长期坚持斗争得来的。先生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使白话文教材读物的编写在字量方面有

科学的依据，他在二十年代初就花了三年多时间，统计了九十多万字的白话文材料，编成中国第一本汉字查频资料——《语体文应用字汇》。这不但对当时的文体改革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也开创了汉字字量的科学研究。

“五四”时期，为了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新教育家们又推行“国语”（即普通话），利用“注音字母”（三十年代改为“注音符号”）解决汉字读音的困难，并因此再度提出清末就提出的文字改革的建议。先生站在教育科学的立场上，对于这些进步的措施和建议，都采取赞助的态度。他赞成文字改革，特别表现在三十年代抗战初期在上海租界主管难民教育的时期。这是我亲自经历和毕生难忘的一段历史。

1937年8月，全面抗战的炮声在上海响起，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集中在敌人还无法占领的上海租界上。战前的各界救国会改组为各界救亡协会，原来已被破坏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也作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团体之一恢复活动，举办了拉丁化新文字的讲习班。我本来在大学念书，战争发生后，学校停课，我就到难民收容所当义务文化教员，晚上也参加这种讲习班。我和班上几个同学觉得这种拼音的新文字简便易学，可以作为扫盲和抗战教育的工具，我们就去收容所试教难胞，结果果然很有效，难胞们也很欢迎。后来在七、八个收容所，都开办了新文字班，由我们担任教师。

1938年初，战线西移，上海租界成了日本占领区包围的“孤岛”。租界当局为了表示“中立”，以免日本人干预，主动取缔租界上的一切抗日活动，不允许任何抗日救亡团体存在。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也被看作抗日团体，禁止活动。

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在党的指示下，经过理事会讨论，决定争取租界知名人士的支持，要求租界当局承认我们为社会教育团体，不作抗日团体取缔，使难民收容所的实验可以继续下去。先生是

著名的教育家，又是那时租界华人教育和收容所难民教育的负责人。在他的掩护下，租界上各公立学校吸收了不少爱国教师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因此我们就想到，要是先生肯出面，替我们向租界当局说话，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我们就请王君恒同志去拜访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提出我们的请求。先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要我们送他一些新文字的书报，并要王君恒同志第二天起就每天去帮助他学习一小时。大概学了三、四次，先生就能够阅读和拼写了。接着他亲自去我们试教的一些收容所进行调查，接连几天，先生研究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接受我们的要求，由他作为保证人，请租界当局批准我们为合法的教育团体，不予取缔。他不但赞成在难民收容所进行这个试验，而且决定亲自抓这件事情，大规模来做。不到一星期，王君恒同志再去看他时，他已经动手在编专给难胞用的拉丁化新文字课本了。这种课本叫《民众课本》，分上下两册，由国际红十字会救济会难民教育股出版，第一册在1938年2月就出了，也就是我们去拜访他的一个月之后。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救济会难民教育股划给我们十个收容所作为试点。这时候，可能有些方面向他提了意见，认为与其用共产党提倡的拉丁化新文字，不如用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学校方面一贯在用的“注音符号”比较现成，也较少阻力。先生为了答复这种意见，就请上海心理学会进行两种方案的教学试验。他亲自教三个小孩子，其中两个学了三星期后，就能够在心理学会表演读写；一个只学了两个星期就能够在会上朗读拉丁新文字拼写的《阿Q正传》。关于这个问题，这年5月底，先生在对上海《大美报》记者的谈话中作了说明。他说：“在普及全民教育的便利上着想，新文字实在比原来的注音符号简易便利得多。新文字的符号比注音符号省略十八个字母，在受教育者的记忆上，无疑省力了一半。注音符号在字体面积上大小相同，难以区别主要和次要，读者消费在字面的注意力，每个字母上完全相等，比起新文

字的每个组合，字母有显著的差异与变化，当然感觉前难后易。”因此他认为新文字的扫盲效果，优于注音符号。也在这个时候，上海正大收容所一位中年难胞殷渥真，用拉丁化新文字给先生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学习经过，赞美新文字的简便易学，要求在收容所加紧推行这种教学，这种来自群众的呼声，使先生极为感动。

从此一直到1939年冬敌伪特务迫害先生，先生不能不离开上海去后方为止，将近两年的时间，先生几乎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放在难民收容所的教学实验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宣传推广上了。他不论出席什么会议，发表什么演讲，都要谈这个问题，而且常常“即知即传人”，当场从口袋里拿出课本来教。他的热心不但影响了许多社会名流，也大大鼓舞了群众。“陈鹤琴热心提倡新文字”，这是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美谈之一，也是孤岛的头条文教新闻之一。

为了在难民收容所大规模试验拉丁化新文字，先生设计了一种徽章。这种徽章是圆形的，中间画有一柄象征开启知识之门的钥匙，钥匙的柄上有“铲除文盲”四个汉字，周围有一圈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的话：“我能看书写字”。收容所的难胞们学会新文字后，就奖给一枚这样的徽章。这年3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假座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第一次难民新文字读写成绩表演会”，邀请先生和当时在学术方面热心指导我们的陈望道先生出席讲话。难胞们的读写成绩非常优越，先生就请陈望道先生给每个表演读写的难胞发这种徽章。

也就在这个月，上海地下党主办的《每日译报》出版《难民特刊》，先生发表了长文《新文字与难民教育》。文中谈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文字改革以及难民收容所新文字教学的意义。他的思想非常开明，认为拉丁化新文字是一种最合于理想的教育工具，说：“提倡采用新文字就是给文盲一个钥匙，有了这个钥匙，他

们就可以自己去开知识之门”。到了4月中，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先生和陈望道、张宗麟等著名人士都出席讲了话。先生又谈了这个问题，肯定拉丁化新文字有利于扫盲。

从1938年5月起，难民收容所的大规模教学实验就开始了。国际救济会难民教育股成立了新文字组，专管各收容所的新文字教学工作；举办了收容所新文字工作人员新文字班，培训新文字师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也相应建立了党小组，加强党的领导。6月难民教育股又发布先生起草的《收容所新文字教育草案》，并举行各收容所的第一次新文字总考试。难民教育股编辑出版的难民教育刊物《民众常识》，也用四分之一篇幅辟了一个《新文字专栏》，供学习新文字的难胞阅读。到8月，国际红十字会救济会宣布举办新文字班的收容所已有48所，班数121班，学习人数4285人，内儿童3144人，成人1141人（男381人，女760人）。

先生进行这个实验非常认真。他考虑到难胞学会了新文字，必须立即供给他们读物才能巩固，因此在亲自编了两册新文字课本后，又编写成套的新文字读物。这套读物上图下文，是连环画式的中外历史名人故事，用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排印。从1938年4月起，出了《岳飞》、《花木兰》、《文天祥》、《郑成功》、《班超》、《爱迪生》、《林肯》、《富兰克林》、《瓦特》、《富尔顿》、《史蒂文森》、《诺贝尔》、《倍尔》、《齐柏林》等14种。其中中国的历史名人，先生选的全是民族英雄。另外他又用拉丁化新文字翻译出版了英国女作家 ovida 的有名小说《穷儿苦狗》，还编制挂图《拉丁化国音字母表》，作为教具。

这年12月，先生又在上海的外文刊物《China Review》（《密勒氏评论报》）用英文发表《论拉丁化新文字》一文，向国外宣传。这篇文章的译文后来载在中文刊物《民族公论》上。

在先生的赞助下，这年上海举办了两个与难民所新文字教学有关的展览会：一个是7月由上海红十字会救济会举办的“上海

难民学艺展览会”，会上陈列有收容所新文字教学的课本、教材、成绩以及墙报等，会场贴有拉丁化新文字的标语，并有难童表演。另一个是9月由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举办的“上海第一次新文字展览会”，会上陈列的收容所新文字教学成绩更多。这两个展览会都由先生主持展出，后一个由我筹备。我至今还记得先生笑容满面和群众挤在一起观看的情景。那时先生经常出入难民收容所的芦席棚，和蔼可亲地和难胞讲话，有时还亲自教课。正是从先生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教育家，看到了真正的教育家的品德。先生的纯朴，使人常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感觉。

这年7月，先生和陈望道先生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邀请韦悫、吴志鸾、王任叔等著名人士和著名教授参加。先生和陈望道先生被选为正副理事长。我们几个青年人也参加了。上海语文学会成立后，就在《每日译报》创刊一个语文副刊，叫《语文周刊》，由陈望道先生主编；又举行全市新文字教师的鉴定考试，先生和陈望道先生亲自监考，成绩合格的都发给证书。学会还计划发起大规模的新文字扫盲运动，准备筹募经费十万元。可惜后来上海租界环境恶化，敌伪的暗杀活动越来越频繁，这个计划没有实行。

1938年下半年，先生已经是敌伪注意的人物之一，同时他在上海热心提倡拉丁化，消息传到后方，触怒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对先生非常不满，叫人阻止。可是先生置之不理，仍旧专心进行他的试验，一直到1939年春夏各收容所陆续解散，难胞分批就业或回乡为止。

1939年8月，收容所剩下没有几个了，先生又抓社会上的成人教育，在“上海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等团体举办的“民众教师训练班”上亲自教新文字。为了躲避敌伪特务的跟踪，先生经常化装在外活动。当时的形势，大家估计敌伪迟早要占领租界，占领后学校都得教日语。为了对学校师生进行“最后一课”的爱国主义教育，先生又和陈望道先生等用“中国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

在11月中举办了一个大规模的“中国语文展览会”，教育人民不要忘记祖国语文。这月底敌伪特务闯到先生家里去杀害他，先生幸外避，未遭毒手。此后，他就再也无法在上海活动，只得抛下家庭去后方了。

到了后方，国民党政府因为先生在上海推行拉丁化新文字，对他极为冷淡，先生也不愿做官，离开重庆到江西的山上，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他的幼儿师范教育。

在党的领导下，上海新文字运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武汉、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上，陶行知、张一馨先生等大声疾呼推行新文字。香港的爱国人士、进步文化界以及新文字工作者成立新文字学会，再一次掀起拉丁化新文字运动高潮。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法令正式推行新文字。1941年年底，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召开第一届年会，把先生和张一馨、陶行知等都列为名誉主席团。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先生从江西回到上海，在上海继续办他的幼儿师范。他还跟过去一样，全心全意从事他的教育事业。由于上海是国民党的统治区，他不便再出面提倡拉丁化新文字，但是仍旧十分关心文字改革。有一次我去访问他，送给我编的几本书，他非常高兴。这个时期，他为民主运动做了不少好事，顶住国民党的压力，保护受迫害的进步教师和学生。他本人和他所办的学校，不止一次受到恐吓和干扰。由于他支持进步教师的活动和学生运动，曾两次遭受国民党特务逮捕。先生这时已进入晚年，更加显得和蔼慈祥。他在学校每天和学生一起做早操，师生们背后都叫他“外婆”。上海解放，先生兴奋极了，首先出席了上海第一次新文字座谈会。这年9月10日北京吴老（玉章）等发起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先生被选为常务理事。先生一生不会半点作假，他是从心底里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党的。不久他就调南京工作，主持南京师范学院，以后一直在南京工作。建国三十年

来，先生始终是文字改革的促进派，发表过好些文章。1955年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他是主席团的成员，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先生性格开朗，在任何逆境下都乐观愉快。1980年夏，全国政协召开五届三次会议，他已八十八高龄，还坐了轮椅出席。我在会场见到他，觉得他的声音笑貌跟四十多年前一模一样。十年动乱中，先生受了不少折磨，尽管在那样的环境中，先生也是乐观愉快的，并不因为一时的乌云密布，而对革命前途和祖国进步失去信心。先生是真诚热爱社会主义的。

我很高兴，在先生一生的第九十个春天看到他的文集开始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新教育事业的重要资料。我回忆了以上这段历史，为文集序。

1982年5月